哲学的伦理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塑造

——访中央党校侯才教授

197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1979年毕业于中央党校理论宣传干部班哲学专业。1980年调至中央党校哲学部工作。1984至1986年为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1991年于中央党校理论部（研究生院）获哲学博士学位。1995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8年为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高级访问学者。1992至2012年先后担任过中央党校哲学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副巡视员兼哲学部党总支书记，哲学部副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2009年起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专业研究方向：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主要学术代表作：《青年黑格尔派与早期马克思思想的发展》（1994）、《郭店楚墓竹简〈老子〉校读》（1999）、《老子在今天》（2007）、《竹简老子——校勘和注释》（德文，2008）、《马克思的遗产》（2009）、《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演变史》（主编，2013）等。

本报记者：戴　菁



记者：侯老师，您好。近代以来，伴随社会的急剧转型，哲学的发展也经历了重大变迁，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向。比如说，在经历了语言哲学和生存论转向之后，更加面向生活世界和世俗化，等等。在您看来，在当代尤其值得关注的主要趋向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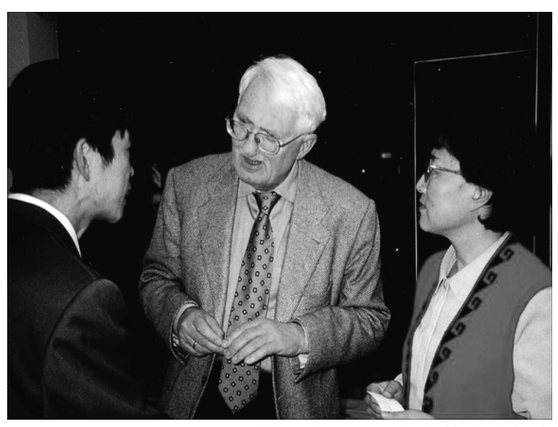
侯才：我认为当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哲学的伦理化。源自黑格尔遗著的手稿《德国唯心主义最初系统纲领》曾明确地预言：形而上学在未来将进入道德之域，而伦理学将成为具有一切理念的完整体系。所谓形而上学将进入道德或伦理之域，是说哲学的发展将以道德、伦理为重点，道德、伦理将成为哲学的“普照之光”。我以为，在当代，或者准确地说，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哲学已经进入道德、伦理之域。

记者：您认为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哲学已经进入道德、伦理之域，这表现在哪些方面？

侯才：这突出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首先，就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特别是认识重心的迁移来说，哲学已经进入道德、伦理之域。伴随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哲学认识的重心经历了由自然到人、由“实体”到主体的迁移。在古代是自然，在近现代则是人本身——开始主要是人的思维、精神层面，后来转移到人的存在、活动层面。与此相适应，哲学的主题和表达形式也经历了由以自然为中心的本体论、到以人的思维为中心的认识论和以人的存在为中心的人本论的演变。这种哲学认识重心的迁移的现实根源，是到了近代社会以后，由于机器工业的出现和近代科学的产生及其应用，社会生产力有了本质性的突变，人借此从自然中提升出来，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体。由此，以往浑然一体的世界被二元化：无所不包的自然成了人所生活在其中的单纯的周围外在环境，而人也俨然成为一种能够主宰其余自然的存在物。这种人类通过其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实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逆转给人们的认识带来的变化是，导致了认识视角的一种根本性的转换，即由“实体”或客体本位转移到主体本位，由对自然和物的关注转移到对人自身的关注。与此相适应，人们实践的主观态度则由客体规定的尺度转移到主体意义的尺度，由对客观对象认知的真理性或科学性的追求转移到对主体存在的价值性的追求。

其次，就哲学与诸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来说，哲学已经进入道德、伦理之域。在人类社会实践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与哲学研究重心迁移的历史轨迹相适应，哲学与其它诸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处在不断的嬗变过程中，经历了从古代的宗教化、到近代的科学化、再到现代的伦理化的历程。在古代，哲学与宗教密切融合。它“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马克思）。即便后来哲学把握了宗教的普遍内容而从宗教中独立出来，也往往难免跟在宗教后面蹒跚而行。在西方，到了11至13世纪，哲学甚至彻底受到了宗教教会的统治，成了神学的奴婢。到了近代，随着理论自然科学的诞生和各门具体科学从哲学中的分化，哲学依靠科学的支持，开始取得对宗教的某种独立地位，作为一支独立的理性力量登场，并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同时，哲学也开始处在科学的影响之下：这尤其表现在作为科学观念、科学精神表征的客观性、规律性、实证性等要求对哲学的浸染和影响。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伴随哲学不再作为凌驾于各门科学之上并包摄各门具体科学在内的“科学之科学”而存在，哲学愈益依附科学和科学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科学独断统治和科学主义的牺牲品。在当代，可以清晰地看到，哲学的科学化早已走到其尽头。正是在对科学和科学主义的独断统治的扬弃中，在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中，产生了哲学的伦理化的需求和趋向。可以说，这种哲学的伦理化倾向从叔本华和尼采，从马克思，从新康德主义就已经开启了。



图为侯才与哈贝马斯教授交流

记者：刚才您谈到，哲学认识的重心经历了由自然到人、由“实体”到主体的迁移。哲学的伦理化对于整个人类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侯才：从根本上说，哲学进入道德、伦理之域是由现代化发展的实践及其需要决定的。因此，一般而论，它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塑造和完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特殊而论，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完成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近代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实践课题就是现代化。这表现在思想理论上，则是一种合理的“现代性”的塑造和构建。当代的思想家、哲学家们普遍认为，人类正在经历的整个现代化过程或者人们普遍谈论的现代性存在着危机甚至是重大的危机。这种危机集中表现在发展与代价、赢取和丧失、创造与毁灭的悖论和矛盾越来越深刻，特别是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传统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被从根本上颠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效力。毋庸讳言，人类正在经历的整个现代化过程或者人们普遍谈论的现代性确实存在着危机。

记者：如何理解和认识这种现代性的危机？它是如何产生的，其根源何在？

侯才：我个人以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是主体的需要和欲望恶性膨胀的结果，是人未能成为自身的需要、欲望的主体的结果。近现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极致化和普遍统治，由于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满足自身需要和欲望的手段空前地提高。与此相适应，人类的需要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即对使用价值的追求变成了对价值的追求。具体而言，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的主要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作为物质财富是具体的、有限的。因而，人们对使用价值、物质财富的追求也是有限的和有止境的。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追求的已不再是直接的使用价值和物质财富，而是价值。价值的增殖和扩张是无限的，没有止境的，因而，人们对价值的追求也是无限的和无止境的，由此导致马克思所揭示的“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据此，我们有理由认定，现代性危机的实质，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由于人的需要的质变和欲望的无节制地膨胀，人愈渐沦落为自身的需求和欲望的客体，而没有成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主体。人能否成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主体？应当说，这首先是一个根本性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问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以说，现代性危机的最终解决或现代化的最终完成可以归结为道德和伦理问题，归结为价值观问题，即归结为伦理学的实践化和价值观作用的发挥。如此说来，哲学的伦理化就为合理的现代性的塑造所必需，成为破解现代性危机的关键环节。这集中表现在：重建价值观和整个价值体系，为人自身的需要和欲望立法，从而有效解决科学性与价值性这一现代性的根本矛盾和悖论。

记者：刚才您还谈到，哲学的伦理化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请您再具体地谈一谈。

侯才：应当明确，由于与现代化过程相伴随和契合，当代中华民族的复兴，其内涵和实质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复兴，而是现代化的实现，即经过工业化、市场化和信息化，完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所谓后工业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具体而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阐释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换言之，是建成一种新型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这无疑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所经历的一次最重大的历史转变，同时也是一场空前的社会变革。

如果说，从哲学的视阈来审视，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和内蕴是“现代性”的塑造，那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和内蕴则是“中国现代性”的塑造。在既有“现代性”的世界话语体系中，“欧美现代性”曾一直独居统治地位，被描述为“全球现代性”的代表或主要标志，甚至被直接等同于“全球现代性”。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完成和“中国梦”的实现，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新现代性即“中国现代性”在世界历史上的确立，意味着既有世界“现代性”话语体系的彻底重释和改写。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现代化过程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从一种较为宏观的历史尺度来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的完成并不意味着现代化过程的结束，毋宁说是现代化过程新阶段的开始。西方思想家政治家们曾热衷于谈论“后现代社会”的来临。其实，所谓“后现代社会”终结的并不是整个现代化过程，而只是现代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它只不过意味着现代化初始阶段的结束和继之而来的新阶段的开始。显然，“中国现代性”仍在塑造和生成的过程中。它仍将继续面临许多严峻的困难和挑战。在这一实践的过程中，无疑不能须臾离开哲学的作用和哲学的伦理化，不能须臾离开道德、伦理和价值观作用的充分发挥。

记者：那么，顺应哲学伦理化的发展趋向，围绕“中国现代性”的塑造和构建这一根本课题和任务，您认为当代中国哲学要做哪些工作？

侯才：当代中国哲学要做的工作有许多，我在近年来发表的相关访谈和文章中都曾论及一些要点，这里仅再补充和强调几个方面。

更加关注和重视社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建设，并使其与法治建设有机结合、融为一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在我国现阶段，关注和重视社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建设，其首要任务就是在全社会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为此提供有力的学术论证和学理支撑。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释、宣传还是进一步提炼，都应充分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担负的主要功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应然趋向和发展目标的界定，它体现了价值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实然性和应然性的统一。

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特别是马克思本人伦理思想的研究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对马克思哲学的传统诠释往往认为，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匮乏，甚至存在空场。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哲学乃至马克思学说的一种误读。事实是，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对伦理学的基本理论进行过学理上的系统阐述，但是，如果从伦理学的维度透视马克思哲学甚至马克思的整个学说，那么，他的整个哲学甚至全部学说都蕴含和体现一种伦理学。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把“现实的个体”即作为个体的实践主体作为自己理论的现实出发点，把“自由人格”（通常被译作“自由个性”）的实现规定为个体的发展和完善的最高目标，坚持利己与利他、改变环境与改变自我的有机统一，诉诸真正的道德实践活动——“自主活动”，把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理解为通过摆脱“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性”而实现的人的“自由人格”的过程，等等，以一种独特和彻底的形式清晰地表述了一种新伦理学——以实践为基础的人格伦理学。特别是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统治下人们所遭遇的“物的增殖和人的贬值”这一根本的生存异化境况及其根源，指出了扬弃异化的路径和合理的发展目标。也正因如此，马克思学说在当代才愈加彰显出它的意义。

继承和创造性转换我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中合理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资源。在我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中，存在着丰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资源，但是，在现阶段，这种资源的挖掘和现代性转换工作却过于滞后，不能适应疾速发展的社会实践的需要。在我看来，要做好传统思想资源的挖掘和现代性转换工作，其思想前提还是提高对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应该充分尊重和高度重视自己的精神遗产，既要反对和防止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更要反对和防止片面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否定文化的民族性，以及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差异和对立等各种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倾向，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开放的心态以及清醒的文化主体意识，大力继承和弘扬自己的优秀文化及其传统。

正确地看待宗教，重视和发挥宗教道德的重要作用。应该看到，宗教道德对于社会的维系乃至对于现代性危机的克服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是社会道德所不能完全代替的。发挥宗教道德的作用，其思想前提是合理地看待宗教，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宗教与政治、与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我觉得既有的传统的宗教观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混淆了宗教与哲学、与政治思想特别是与政治信念的界限，对此必须加以厘清和纠正。

充分重视和发挥政治伦理的功能。可以说，政治伦理是道德和伦理的核心一环。在我国现阶段，政治伦理建设特别是官德建设无疑是整个道德和伦理建设的关键。对权力的有效约束，无疑需要构建德—法双重网络结构，要重视和强化客观的、外在的、显性的立法，同时也要重视和强化主观的、内在的、隐性的立法，使两者彼此结合和相互辅助。这样，才能确保权力的合理运行。

一级教授访谈

作为为己之学的学术

□侯　才

“学术”是个近乎神圣的语词。由于它关涉对宇宙万物和人生之根本的认识，古人常称其为“道术”，意指专门、系统且具有根本性的学问，故有“天下莫大于学术”之说。学术作为人类专门认识活动的产物，是文化的结晶和精华，承载和映现人类精神，能够滋养、完善社会个体和整个民族，引领社会和时代前行。由此，决定“为学”成为一项艰苦而崇高的事业。

“为学”与“为人”是统一的。确切地说，为人与为学原本是一件事。古人云：“德行、学问本一也”。为学与为人的同一体现在：人是主体，为学是主体的活动，因而是主体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人格在为学中对象化、外化，从而在学术成果中得到体现和映现；一方面，为学又使学术内化，反过来塑造乃至规定人格。可见，为学与为人不过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为学从根本上说可以归结为为人。毋庸讳言，在现实中，人们常常看到为学与为人相互分离的情形。这种情形的出现，究其实际，除了缺乏学术自觉之外，往往是因为为学在功利、私利的诱惑下，脱离了为人这一目标。

将为学从根本上归结为为人，为学就成了“为己之学”。孔子曾强调“为仁由己”，学是“为己之学”。这里所说的为己，当然不是说为一己之私利，而是说为学的功用首先应是用来提升和完善自我，用于自己修身、做人。那么，这与“为他”是否存在差异、矛盾？其实，将为学作为为己之学，也就使为他具有了根本的前提和条件，也就真正做到了为他，从而实现了为己和为他的统一。试想，如果自己昏昏，如何使人昭昭？如果自己尚迷，如何度人？孔子提倡“为己之学”，是针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颓变世风，意思是说，古代的人做学问，首先是为了提升、完善自我，而今天的人做学问，却变成是单纯给他人看的了。在今日市场经济条件下，此类世风愈甚，可见为己之学及其精神的可贵和重要。

将为学归结为为己之学，在一定意义上学术就被归结为道德，而为学就被归结为道德修养和践履。因此，可以说，为学的根本奥秘在道德之中。通晓此奥秘，也就找到了为学的真实门径。这其中的道理在于，学术以道德为始源和根基。孔子力倡“据于德”，他在《大学》中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深刻地阐释了为学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在这里，明德、至善被作为思有所得的根本和前提。老子也强调“重积德”，认为“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惠能明确主张“善生慧”，甚至认为“见一念善，智慧即生”。老子和惠能的论述，分别说出了道德的本体地位以及认知对于道德的依赖性，尽管未直接论及为学，但包摄和内含为学，不啻对为学规律的一种透辟说明。

善所以能够生慧，是因为唯有善才能够生静，而静是慧的直接前提和必要条件。正因如此，古人在长期的治学实践中得出了“宁静致远”这一基本认识。孟子对此加以总结和发挥，将为学之道归结为“放心”。他说：“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这一“放心”之论，被誉为“千古学问断案”和“千古学问指南”。

若以孟子“放心”之论来检视和反思：当今我们的理论特别是哲学理论为什么难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其中当然有各种主客观原因。譬如，在客观方面，我们的现代化过程比起西方某些发达国家还相对滞后，我们的综合国力在世界的地位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这势必在根本上影响中国学术理论特别是哲学的发展以及在世界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除了这种客观条件，在主观方面，大概也有一条原因不容否认，就是在外界各种物欲的诱惑下，在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形式出现的功利主义的诱惑下，我们的学术理论和哲学之心难以平静了，违背了“宁静致远”的古训，从而影响了理论的洞察力、穿透力和前瞻性，并造成甚至加剧了历史视界的愈益扩大同我们的理论眼光愈益短浅之间的矛盾。须知，当我们急功近利而为学、而运思之时，澄明之心就已被遮蔽了，悟性、灵感就已离我们而远去了。

如何静心、安心、放心？这取决于如何对待欲望，即如何处理理性与欲望的关系、矛盾。“欲”乃人性之自然，亦为历史发展之动力。但欲不仅有公私之分，而且有度的界限，有合理与否之别。相对于为学，古人重视对各种外物之欲的驾驭和统摄，故有“遣欲”“制欲”“寡欲”以及“外物”（“外”为遗忘之意）“不住”“放下”等等之说。《醒世恒言》中载有一条寓言，颇令人回味和警醒。文云：薛录事（“录事”为官名）于高烧昏迷中做梦，梦见自己化为鲤鱼，跃入湖中，恰遇渔夫垂钓，明知饵在钩上，吞之必祸身，但却耐不住饵香扑鼻，于是张口咬之，终被钓去。作者点评曰：“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由此观之，或许有理由将为学之道的关键归结为：人是否能够使自己成为自身欲望的主人。

做好基层党校科研工作的对策

□周宗成

由于受主客观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基层党校的科研工作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比如，科研成果价值不高；科研的动力不足；科研资政力量和能力不强；科研工作组织化程度不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着力提升科研成果的档次。一是强化科研精品意识，推出精品力作，力争在省部级等重大项目申报立项上实现新突破。二是积极为教研人员发表文章创造条件，力争在核心刊物、公开刊物发文数量稳步增加。三是强化资政导向，拓宽资政途径，力争决策咨询成果领导批示及转化率明显提升，使决策、服务决策、影响决策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四是在科研成果评选中，力争省部级等高等次奖项获奖数量明显增加。五是引导教师紧跟国内外学术前沿。

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一是建立健全科研管理条例、科研成果管理办法、校级课题立项、科研资政奖励办法和随时奖等制度，在课题立项、经费配套、出版资助、成果奖励等方面进行系统设计，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激励约束机制。二是充分尊重科研投入与产出的客观规律，建立合理的科研经费投入机制，适当提高优秀科研资政成果的奖励标准和项目资助标准，鼓励教研人员多出精品。

加强人才引进和科研骨干的培养。一是坚持“人才强校”战略，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根据党校科研学科建设的需求，重点引进教学科研紧缺的人才，改善教师学科和年龄结构，提高科研竞争力和办学软实力。二是加大科研骨干的培养力度，拓宽科研骨干的学术空间和视野，使科研骨干在服务党委政府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立足挖掘现有教研人员潜力，为教师走出去调研、送出去培训、派出去锻炼提供条件，使他们在不断学习培训和学术磨炼中成长为科研骨干。

推进科研组织形式创新。一是充分发挥校委会在科研组织上的统筹作用，加强科研规划的制定和落实，加强科研活动的策划与组织，及时研究和解决科研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为打造科研工作的升级版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二是引导教职工更加重视现实问题研究，把党委政府工作的“关注点”“兴奋点”作为党校科研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加大应用性、对策性研究，提高为决策咨询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三是实行全员科研战略。组建若干科研小组开展区情调研，在全校树立起全员科研兴校的意识。四是实施集体攻关。对于一些重大科研课题，必须以科研骨干为中心整合力量，组建团队，集体协作攻关，使科研组织形式由单打独斗向联合攻关转变，增强科研的整体实力。五是加强纵向横向协作。支持教师承接并完成上级党校和其他兄弟党校的协作课题，强化党校系统的整体优势；积极争取横向科研项目，与党委政府部门建立合作研究机制。六是发挥学员作用。

（作者系重庆市委党校万州分校副校长）

科研论坛